

■ 王国贤 著

台湾十年嬗变

■ 华艺出版社

台湾十年嬗变

(1986——1996)

王国贤 著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台湾十年嬗变/王国贤著.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5

ISBN 7-80039-112-4

I. 台… II. 王… III. 台湾-政治-研究 IV. D67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7222 号

台湾十年嬗变

王国贤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门牌胡同一号
编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

一二〇一印刷厂

850×1168 1/32 13.75 印张 328 千字

1997 年 5 月第一版 1997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或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ISBN7-80039-112-4/Z · 289

定 价: 19.00 元

序 言

1986年，对于台湾来说，是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是年3月，国民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台湾开始进入政治转型期。十年以来，台湾政治转型与经济、社会等诸方面转型相互作用，权力结构的异动、政治势力的消长与内外政策的更张相互制约，各种矛盾的起伏与社会思潮的涨落、民众意愿的向背相互激荡；同时，这些变迁又与国际格局的转换、祖国大陆的发展、两岸关系的演进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因果互动关系，使得1986年至1996年成为国民党退踞台湾以来，岛内局势变化幅度最大、速率最快的时期。

十年来，台湾经历了从“后蒋经国时代”到“李登辉时代”的过渡。随着一系列政治变革举措的出台和实施，岛内的政治体制、权力结构、政坛矛盾等均发生了令人瞩目的重要变化。戒严的解除，党禁报禁的开放，“动员戡乱时期”的终止，“临时条款”的废除，“中央民意机构”的改造，“修宪条文”的通过等等，促使以“戡乱”、“复国”为基轴，以“强人政治”为特征的“非常体制”走向终结，以西方式“民主政治”为蓝本、以国民党政权“台湾化”为实质的“常态体制”逐步建立。在上层权力的“世代交替”中，国民党主流派、台籍要员、中生代技术官僚为主体的政治势力取代了蒋家成员及其亲信重臣为骨干的外省籍元老派，形成全面主政之势。“政治强人”故去后出现了权力变局，为各种政治势力提供了放手角逐的空间，围绕着上层权力分配和内外政策走向等问题，国民党内的派系矛盾和权力斗争不断升级，导致该党出现了十四大召开前夕和“总统”直选期间的两次分裂危机，最终形成以主流派坐大、非主流派式微的结果。面对“政党政

治”的发展和在野势力的挑战，国民党加速自身的调整和改造，不得不改变一党专制、支配一切的做法，刻意扮演参与“公平竞争”，愿意接受在野势力制衡的“民主政党”角色。与民进党、新党等主要反对党之间形成了既对抗又沟通、既竞争又协商的关系，三党之间合纵连横、借力打力现象增多，互为朋友、互为对手的关系不时转换。政党之间的全面竞争、各个层级的权力分配、政治变革方案的付诸实施等，大都要通过选举这一主要形式。海外一位学者曾将台湾的选举比喻为“制度化、非军事化的定时性内战”，认为“台湾社会每经过一次选举就会蜕变一次”。自1986年举行增额“国大代表”、“立法委员”选举以后的十年期间，台湾各种选举日益频繁，从“中央民代”到“地方议员”，上至“总统”，下至村、里长，层层有选举，年年有选举。通过一次次竞争激烈的选战，强化了台湾主要党派的实力消长趋势，加速了各种政治势力的分化组合，改变了岛内的政治生态和权力版图。

从某种意义上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台湾“政治革新”的启动和深入推展，必然带来“外交”政策的更张。特别是蒋经国去世、国民党十三大召开以后，台湾当局的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突破了“法统”、“名份”的囿限和“汉贼不两立”的反共外交原则，以“一国两府”、“双重承认”为理念和构想，极力推行“弹性外交”和“务实外交”。台湾当局以国际格局转换为契机，利用冷战结束后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比重增大等条件，以经济援助、军备采购等为筹码，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交往模式，多种外交手段交替使用，如“金元外交”、“农技外交”、“白米外交”、“租税外交”、“航权外交”、“政党外交”、“国会外交”、“军售外交”、“过境外交”、“校友外交”等等。其“外交”工作格局、任务、目标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主要从三个层面拓展“国际生存空间”：一是扩大“邦交国”数量。在台湾当局的“银弹攻势”下，从1989年至1996年，中南美洲、非洲先后有巴哈

马、格林纳达、利比里亚等 11 个小国与台“建交”或“复交”，使台的“邦交国”一度增至 31 个。二是提升与无“邦交”国家的“实质关系”。以美台、日台关系为样板，以欧洲、东盟国家为重点，从促成官式互访、驻外机构更名升格入手，不断提高与大中型国家的“实质关系”层次。三是参加国际组织。按照先区域性后全球性、先经贸性后政治性、先民间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顺序，争取加入更多的有影响的国际组织，近几年的主要目标是加入其前身为 GATT 的世界贸易组织（WTO）。80 年代后期以来，台湾当局利用各种时机，频繁进行“外交出击”，并多次声称在拓展对外关系中“大有斩获”、“捷报频传”。但是，其“弹性、务实外交”总的看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的。被视为台“外交重镇”的沙特、韩国相继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大陆建交；1996 年 11 月，台“邦交国”中唯一的非洲大国南非已作出同样的抉择，并正式宣布于 1997 年底付诸行动。南非的“弃岛登陆”，再次敲响了台对外关系的警钟，进一步证明台湾当局的“务实外交”无法使其摆脱在国际社会孤立的困境。

台湾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结构的改变，中产阶级的崛起，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是岛内政治变革的基础和动力。而“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的推展，又促使台湾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日趋“多元化”。80 年代中后期，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和报禁之后，岛内社会环境逐渐宽松。各阶层民众为了维护和争取自身的权益，纷纷举行多种形式的“自力救济”运动，“劳工运动”、“环保运动”、“学生运动”、“老兵运动”、“妇女运动”、“客家人运动”、“原住民运动”等此起彼伏，遍及全岛。作为“自力救济”运动的参与者，往往被视为“弱势团体”的成员；而作为一票在手的选民，他们在选举中则一跃成为政治市场的主顾。选民们从本族群的利益出发，用自己的衡量标准，投票选择心目中的候选人。岛内数以万计的选民，其心态千差万别，价值取向

“多元化”，但从多次选举中，也可透视出选民们的主流心态，如求稳怕乱，不满弊政，推崇菁英，注重权益等。一些政治禁忌相继被打破后，以前在专制高压下长期酝酿的社会矛盾即充分暴露出来，各种社会思潮的涌起，不同价值观念的碰撞，对岛内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心理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使他们对精神生活的寄托和物质世界的追求发生了明显变化。在社会竞争加剧，升学、就业等多重压力增大的情况下，发奋者有之，迷惘者有之，颓废者有之。急剧变革的时代既能造就具有社会责任感的“青年才俊”，也可产生诸如“庞克族”、“霹雳族”、“飚车族”、“暴走族”等行为怪异的族群。民众心理的失衡往往与社会行为的“脱序”互为因果，致使社会问题丛生，治安持续恶化。多年来，暴力凶杀、黑道猖獗、贩毒吸毒、雏妓色情、少年犯罪等一直是台湾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

1986年至1996年，也是台海局势急剧演变的十年。台湾当局迫于中共对台方针政策和岛内外民意等压力，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大幅度调整其大陆政策，以“民主、自由、均富统一中国”取代了“反共复国”、“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逐步松动“三不政策”，采取政治渗透与和平竞赛的策略，循序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和两岸经贸、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双方的人员往来和各项交流经历了解冻起步、渐次推动、迅速发展等阶段，交流交往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双向化程度与合作层次逐步提高，民众参与面日益扩大。十年来，来大陆探亲、旅游和从事各项交流活动的台湾同胞已达900多万人次，两岸间接贸易额累计逾700亿美元，文化、科技等交流也带来了许多具有积极意义的效应。同时，双方为解决两岸交流中衍生的问题建立了沟通、协商渠道。1993年4月，“汪辜会谈”如期举行，标志着两岸在接触商谈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1995年1月，江泽民主席发表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带来

了新的契机，在台湾各界人士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同时，应该看到，两岸关系总是在曲折中发展，缓和中有紧张，交往中有斗争。由于台湾当局的内外政策和大陆政策越来越背离一个中国的原则，日益明显地纵容“台独”势力，在国际上加紧推行“务实外交”，肆意制造“两个中国”，大搞分裂活动，使两岸政治分歧扩大，外交领域的对抗加剧，军事方面的对峙升级。特别是90年代中期，台湾海峡进入多事之秋，受1994年“千岛湖命案”、李登辉与司马辽太郎谈话，1995年李登辉访美等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两岸关系大起大落，一波三折，到1996年3月台举行“总统”直选时，两岸之间紧张、僵持局势达到了多年来所罕见的程度。时至今日，台海阴云未散，僵局犹存，两岸关系仍在低谷中徘徊。然而，开启的大门不可能重新关闭，两岸交流交往的发展势头不会逆转。随着港澳的回归，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祖国大陆在两岸关系中 will 握有更多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当台湾进行全面转型，岛内政治、经济、社会等诸方面发生重大变化之际，台湾问题即成为大陆社科界日益热门的研究领域。笔者刚好是1986年台湾转型期开始时涉足这一研究领域的。十年来，一直关注着岛内局势的演变和两岸关系的发展，通过浏览自己所能收集的各种书刊资料，参加有关学术研讨会，赴台进行学术访问，接触台湾学术界及其他各界的朋友，来了解、观察台湾，不时变换角度，追踪岛内发生的令人瞩目的大事，进行分析探讨。自1996年撰写第一篇分析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文章以来，共写了80余篇有关台湾问题的研究文章，主要涉及岛内政局、对外关系、台湾社会、两岸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其中，部分文章系参加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有些是学术刊物和有关报章的约稿，也有的是自选性的研究课题。近来，笔者将其中近50篇文章整理成四个部分：一是岛内政局的演变，二是对外关系的走势，三是社会民意的脉动，四是台海形势的发展，以《台湾十年嬗变》为书名

结集成册，商请华艺出版社出版。这既是对十年来台湾政治、社会、内外政策、两岸关系演变轨迹的勾勒和描述，也是对自己在这一时期有关研究心得的回顾和总结。

在多年的研究工作中，我得到了海峡两岸许多专家学者、同仁朋友的帮助和支持，在本书付梓之际，对他们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谢意。衷心感谢张亚汎、姜殿铭、陈孔立、郭震远、杨开煌、范希周、周建明、张五岳、沈卫平、辛旗、林正义、石之瑜等教授的指教；衷心感谢台湾淡江大学林云山校长、张家宜副校长、张五岳所长的热情邀请和周到安排，使我能有机会赴台进行学术交流。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华艺出版社孙波、李长顺、杜建业先生，金丽红女士，黎波、宋福江先生等的大力帮助，在此深表谢忱。

这本文集按其书名本应涵盖更多的内容，如深入探析 80 年代中期以来台湾经济的转型及其影响等。因本书的体例、内容和撰述方式等不同于台湾当代史，且经济问题非笔者的研究方向和重点，只好付以阙如。由于本人学识水平及资料来源所限，书中疏漏舛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有关专家、学者和读者不吝赐教。

王国贤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于北京

目 录

序言	(1)
----	-----

第一编 岛内政局的演变

1. 台湾进入政治转型期的标志	(1)
2. 蒋经国去世后国民党内的权力纷争	(8)
3. 台湾“副总统”候选人为何出现“黑马”	(21)
4. 民进党起步阶段的发展策略	(25)
5. 台湾政治转型期的国民党中生代	(48)
6. 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对岛内政局的影响	(58)
7. 台湾第二届“立委”选举态势分析	(62)
8. 国民党两大派系斗争的焦点和趋势	(67)
9. “连内阁”的施政走向	(72)
10. “新 K”形象素描	(77)
11. 从国民党十四大看岛内政局	(84)
12. 台湾县市长选举后的岛内局势	(88)
13. 台湾省市长选举情势分析及预测	(92)
14. 一省二市选举与三党实力消长	(99)
15. 台湾第三届“立委”选举后政治版图的变化	(110)
16. 九十年代前中期台湾政局演变的基本特点	(119)
17. 台湾举行首次“总统”直选的前因后果	(129)
18. 台湾“总统”直选后岛内政局的演变	(142)
19. 台湾岛内“废省”之争简析	(151)

第二编 对外关系的走势

1. 台湾当局推行“弹性外交”的意图及后果 (155)
2. 美台关系的历史演变及发展趋势 (166)
3. “三大因素”的变化与台湾对外关系的发展 (185)
4. “戡乱时期”终止后的台湾对外关系 (199)
5. 台湾当局对外政策走向及影响 (205)
6. 台法提升“实质关系”的动向和原因 (214)
7. 台湾当局对中沙建交的因应措施 (218)
8. 冷战结束后美台关系的发展演变 (222)

第三编 社会民意的脉动

1. 当代台湾青年思想心态综析 (231)
2. 台湾转型期青少年生活情趣的变化 (239)
3. 台湾各界对开放探亲问题的态度 (255)
4. 解严后台军方与新闻界关系的调适 (260)
5. 台湾“原住民运动”初探 (267)
6. 台湾五种社会现象面面观 (275)
7. 台湾选民心态概录 (283)
8. 《一九九五闰八月》及其轰动效应 (288)

第四编 台海形势的发展

1. 试析国民党当局对和谈统一的基本策略 (297)
2. 东欧苏联变局与海峡两岸关系 (303)
3. 八十年代后期两岸关系的特点及走势 (313)
4. 终止“戡乱时期”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323)
5. “戡乱时期”终止后两岸政治互动关系前瞻 (327)
6. 分裂国家“统一模式”对海峡两岸关系的影响 (333)
7. 国际格局转换中海峡两岸的竞争与合作 (338)

8. 喜有有忧 乍暖还寒	(354)
9. 台湾各界对江泽民重要讲话的反应	(361)
10. 中华传统文化与海峡两岸关系	(367)
11. 对两岸关系如何走出低谷的思考	(379)
12. 1995 年台湾当局大陆政策评析	(382)
13. 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回眸与前瞻	(392)
14. “台海危机”之后台湾当局大陆政策走向	(409)

台湾进入政治转型期的标志 ——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初析

1986年3月底，国民党在台北市阳明山中山楼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这是国民党当局退踞台湾30多年来，为因应岛内外政治环境的巨大变化，而召开的一次不同寻常、具有转折意义的全会，它标志着台湾开始正式进入政治转型期。

一

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具有复杂的背景和动因。

从岛内情势看，六、七十年代以来，台湾经济持续发展，促使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中产阶级迅速崛起，其政治参与意识随着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提升而不断强化。党外势力逐步积蓄力量，着手建立自己的组织，1983年以来，相继成立了“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党外选举后援会”、“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等等。在1985年11月举行的省市“议员”、“县、市长”选举中，党外势力获得了可观的选票和席位，在21位“县、市长”中占4位，在174个省市“议员”席位中占28席。同时，实力不断增强的党外反对势力向国民党当局的高压政策进行猛烈抨击，其抗争活动迅速升级。国民党去台近40年来，一直维护着名不符实的“法统”，实行反共军事戒严和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深受台湾社会各界的诟病。国民党当局建立在“戒严”、“戡乱”架构上

的畸型的非常态体制，与趋于“多元化”的台湾社会的矛盾日益尖锐，其在台的“执政地位”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挑战。

从国际政治环境看，进入 80 年代后，“民主运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逐步形成热潮。美国鉴于世界“民主潮流”的发展，为了更有效地维护其在台利益，不断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力促蒋经国放弃“世袭式”的传子部署，改变家族专制统治体制。美国还专门成立了“台湾民主促进会”，有意扶植岛内的党外反对势力，警告国民党当权者“不要筑起高墙竭力阻挡改变现状的民主潮流”。蒋经国迫于内外压力，于 1985 年 8 月和 12 月两次公开表态，称“不能，也不会”由他的家人来继任“总统”。1986 年菲律宾“二月革命”的发生，对美、蒋的震动都很大，均从中吸取了教训。在美国看来，一个亲美反共的独裁政权必须改变其统治体制，否则就会被“民主潮流”所淹没；在台湾当局看来，必须按照美国的旨意，把国民党改造成为“民主政权”，否则，就无法摆脱像马科斯政权那样遭民众唾弃，被美国抛弃的厄运。马科斯垮台这一事件，对蒋经国起到了很大的警示作用，使其加深了国民党在台统治难以为继的危机意识，也增强了推行政治变革的紧迫感。

从海峡两岸关系看，台湾当局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陆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中英两国政府通过政治谈判，于 1984 年 12 月正式签署联合声明，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解决了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问题。这一声明签署后，中共领导人多次针对台湾问题发表谈话，指出“香港问题的解决会直接影响台湾问题的解决”，“一国两制”政策也适用于台湾，“对台湾的条件比对香港更宽”，“希望台湾当局能以和平谈判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作出明智的抉择，为民族腾飞共同贡献力量”。中共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以及“三通”主张，在台港澳及海外华侨社会引

起强烈反响。岛内各界人士、海外侨胞以及国民党内一些上层人物，对台湾当局坚持反共拒和的僵硬立场表示不满，呼吁台湾当局在改善两岸关系方面“采取较有超越性和突破性的做法”，恢复两岸之间的正常往来。他们相继举办有关台湾前途与两岸关系问题的各种研讨会，发表大量言论，批评国民党当局的“三不政策”，探讨促进两岸各项交流，实现中国和平统一的途径。1985年11月，台“行政院长”俞国华把“中共统战”列为台湾面对“三个方面挑战”的首位。面对内外交困、人心动荡的局势，国民党的党政要员越来越深切地感到，如果不实行革新，将难以维持其偏安一隅的统治。

二

据台湾报刊报道，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检讨过去，策励未来，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开拓国家光明前途”，这次全会的中心任务是，确立“政治革新”的方针和以“政治革新”带动“行政革新”以至“全面革新”的政策。全会始终围绕“政治革新”的基调进行。蒋经国以《迈向胜利的新历程》为题致开幕词，声称“要全面推行民主宪政，切实做到国是决定于公意”，“废除一切加于思想和身份的禁锢，使社会充满自由、开放、和谐的朝气和活力”。俞国华在“行政工作报告”中提出，“厉行民主自由宪政”，“促进安定和谐的社会，要有公平竞争的活力”。根据蒋经国的意图，全会通过了题为《承前启后，开拓国家光明前途》的决议案，提出“要以党的革新结合行政革新，来带动全面革新”。这次全会改选了中常会，增选了年富力强的李焕、吴伯雄、施启扬、陈履安，以取代孙运璿、马纪壮、阎振兴和赵自齐。蒋经国进行上述人事调整，是着眼于推行其革新路线，是从4位新人对“政治革新”的态度以及与国民党的渊源出发的。此外，全

会还阐述了两岸关系与中国统一问题，从政治、经济、社会、文教、对外关系等5个方面提出了“国民党对于中国统一问题的主张”。

为了落实蒋经国在十二届三中全会的讲话精神和全会通过的决议案，此次会议闭幕8天后，国民党中常会即决定成立以严家淦为召集人的12人小组，成员有谢东闵、李登辉、谷正纲、黄少谷、俞国华、倪文亚、袁守谦、沈昌焕、李焕、邱创焕、吴伯雄，他们均为中常委。这个小组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政治革新”进行研究和规划。该小组成立的当天，蒋经国特地约见李焕、吴伯雄等4名新当选的中常委，强调“政治革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感。

在蒋经国的督促下，12人小组对“政治革新”内容进行了深入研讨，于当年9月初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提出并确定了六项议题：一是解除戒严，即解除1949年5月由台“警备司令部”颁布的《台湾地区紧急戒严令》，拟以《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代之。二是开放党禁，拟通过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动员戡乱时期选举罢免法》，在一定的规范下允许成立包括政党在内的政治性团体。三是充实“中央民意机构”，在维护“法统”的前提下，适应“民主政治”的需要，大量增加台、澎地区的“民意代表”。四是“地方自治法制化”，拟制定颁布《省县自治法》和《直辖市自治法》，“省主席”和“院辖市市长”由官派改为民选。五是“革新党务”，改进国民党的组织、训练、文宣等方面的党务工作，使之“与社会需求结合”，“与民众结合”。六是改善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如果说改选中常会、组成12人小组是蒋经国为推动“政治革新”所采取的组织措施，那么上述六项革新议题的确定，则是将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政治革新”方针的具体化，明确了任务和目标。

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是推行“政治革新”的党内动员会，也是其重要政策调整的宣示会，它拉开了台湾政治转型和社会变革的序幕。从这次全会确立“革新路线”、改选中常会，到成立 12 人小组，提出“六项议题”，前后不到半年时间，可见蒋经国对“政治革新”具有很强的紧迫感。在蒋的主导和力促下，这些举措的推出，特别是“六项议题”的付诸实施，将对台湾岛内局势及海峡两岸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

1、国民党在台湾政坛扮演的角色将进行大的调整。这次全会召开不久，蒋经国即明确指出，“以十二届三中全会为一个分界线，在此之前，国民党的作风确实保守，在这之后，将采取较开朗的做法”。此后，他又在一次中常会上强调，“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种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推动革新措施”。这进一步表明，国民党迫于岛内外形势的急剧演变所形成的多重压力，不得不调整其在台湾政坛的角色地位，拟改变一党专制、支配一切的做法，允许成立包括政党在内的政治性团体，从长期垄断的政治资源中，有限地开放一些权力空间，在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与刚出炉的小党进行各项公职竞选，以扮演积极参与“公平竞争”、愿意接受在野势力制衡的“民主政党”的角色。

2、台湾政治体制将发生明显变化。“政治革新六项议题”，首推解除戒严。实施了 30 多年的“戒严令”的废除，意味着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改变军事戒严体制，从“非常体制”向“常态体制”过渡，其统治手段由战时“军事管制”逐步转向平时的“法律、行政管理”。与此相适应，党禁的开放也是大势所趋，国民党不得不在政治上放松一党专制，在保证既有权力和维持“法统”的前提